

从国王到最低等的绅士，都系于封建宗藩体系，这种状况最不利于培养和平的技艺，乃至维持和平本身，也造成了底层人民的奴役，这是封建体制不可避免的邪恶。封建体制从来不能让国家保持在适当的战备状态，从来不能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用于防务，更不能防备公共的敌人。军事封臣不习惯服从，缺乏战争经验，根据出身而非功绩或劳绩获得军职。他们组成的军队杂乱无章，结果战斗力极其低下。他们因领有采邑而有义务参战那几天，经常危害自己的君主，而不是危害他们应召抵御的敌军。君主渐渐不再使用这样累赘而危险、很容易适得其反的机构，转而与特定的军官签订合同，以金钱购买军事服役（意大利人称之为雇佣军），在战争结束时解散他们。^①男爵和骑士们也经常与君主签订这些合约。他们的领地有附庸、佃客可用，还有无法无天、为数众多的浪人，乐于抓住机会，满足他们对战争和掳掠的渴望，不难凑齐兵员。

此时，哥特式封建旧制已经为人淡忘，日益崩坏。尽管征服者威廉将英格兰的土地分为六万个骑士封地，由于各式各样的诡计，骑士的数目却不断减少。国王最后发现：执行法律，他只能召集王国古代军队的很小一部分。国王和大领主的军事封臣往往将封地转让给教会，再作为教会永业领（*frankalmoigne*）重新封授，借此规避军役。^②等到禁止这种弊端的法律制定出来，已经为时太晚。王国面目全非，新条例已经无法充分纠正。我们不难推测：像当时的其他法律一

① Cotton's Abr. p. 11.

② Madox, p. 114.

样，法官很少认真执行这些触犯这么多人永久利益的条例。治安官和大司马召集军队，通常时机紧迫、无暇核对名册，只得接受骑士员额不足的贵族从征。这种不利于国王的先例一旦形成，以后就会成为军役每况愈下的原因。^① 骑士名册的保管杂乱无章，军队就要投入战场，不能留心勘误。那时，再考虑清查记录和特许状已经太晚了。封地一再分割、合并，其大小和性质都已经暗昧不明，只有封臣自愿回馈，军役才能实现。^② 不难判断，这些错综复杂的状况伴随着多少个人争执。教会的军事封地享有固定、不可剥夺的财产权，甚至它们的数目也有很大争议。亨利二世的女儿嫁给萨伏伊公爵时，向达勒姆主教征收他手中七十个骑士封地的补助金。主教只承认十个，否认另外六十个。^③ 不清楚这个差额是怎样解决的。但如果问题在于拿起武器、保卫王国，主教的十个骑士封地可能不会引起反对，固定为此后的军役标准。因此，免役税和军役减少得一样多。^④ 必须设计别的方法充实财源兵源。新情况产生了新法律和新制度。王室和私人产业在财政和军事上的重大变革同样是立法、民政方方面面的创新之源。

诺曼男爵和领主授予的领地不在法律规范之内，但也没有长期保存、不受损害。地产渐渐分割，落入更多人手中。广大的男爵领地因为资助幼子，因为分割遗产，因为出售，

① Madox, p. 115.

② Madox, p. 116.

③ Madox, p. 122. Hist. of Exch. p. 404.

④ 为了筹集理查德国王的十万马克赎金，每个骑士封地摊派二十先令。如果骑士封地仍然保持征服者威廉时代的原状，免役税就会有九万马克，与要求的赎金相去无几。但我们发现，为了凑齐赎金，不得不征收其他令人痛苦的税。这足以证明骑士名册已经面目全非。

因为国王没收赏赐给廷臣，因为分割交易，最终分割成小块。考虑到经济，规模适中的领地要求业主留在家里精打细算。骑士和小贵族越来越多，开始构成国家一个相当可观的等级。他们都是王室的直接封臣，领有军事采邑。因此，根据封建法律的原则，他们与大领主有同等资格出席国家议事会或大议事会。这种权利通常被视为特权，然而业主即使不想完全放弃，至少也视为负担，只希望在特殊情况下偶尔行使一下。因此，约翰王的宪章提到：国王以个别令状召集大领主参加国家议事会，郡长只需普遍召集称为骑士的小贵族即可。大小领主的区别就像穷人与富人的区别一样，没有明确界限。不过，这很符合不求精确的时代精神和古代政体的简陋形式，给国王及其大臣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很大余地。同一位贵族，这一届国会受到国王个别召集，下一届国会又被忽略了，司空见惯。^① 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应该抱怨的伤害。要求他出席国会，他就出席。下次没有要求，他就很高兴豁免了这个负担。因为骑士与大领主属于同一个等级，理应在大议事会据有一席之地，无论是他自愿出席还是受国王召唤。因此，根据令状召集的贵族和根据封地领有权召集的贵族很快就混合在一起。卡姆登告诉我们，^② 根据现已失传的古​​代手稿，伊夫舍姆战役后制定的法律宣布：贵族不经个别召集，不应出席国会。以后，英格兰所有贵族都应该通过令状召集，事实上废除了封地领有的重要特权。只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总是

① Chancellor West's enquiry into the manner of creating peers, p. 43, 46, 47, 55.

② In Britann. p. 122.

接到令状时，忽略他们才会视为冒犯甚至伤害。

最高级贵族伯爵也渐渐发生类似变化。伯爵的尊荣像男爵一样，源于古代封疆大吏的职务。^① 他主持本郡司法，抽取三分之一罚金为自己的收益。他兼理军民。虽然诺曼征服以来，伯爵已成世卿，这个爵位仍然与职务有关。国王若想封授新伯爵，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划出一块土地，成立新郡或伯爵领，封授给他选择的人或其家族。^② 但郡长是国王提名的伯爵副官，可以随意撤换，对国王更加顺服，因此国王试图将所有的司法行政权都交给郡长。这位地方官是财政首脑，征收国王在郡内的全部租金。他随心所欲地评估王室领地内居民的领地税，经常为国王办理监护权和产业充公事宜。他负责主持下级法庭。因此，虽然郡长的品阶地位不如伯爵，但他身兼司法、财政大权，受国王信托，实际权力胜过了伯爵，暗中破坏伯爵在自己辖区的司法权。^③ 一般的做法是：国王封授伯爵，给他固定薪水，通常大约一年二十镑，代替三分之一罚金。伯爵的权力和收益同步下降，由封疆大吏降为个人有名无实的虚衔。这一剧变已经在上议院完全实现，或是逐步演变实现。在上议院，也就是在国会，因为古代似乎只有这一院。

王室以令状召集贵族、封授伯爵，加强了自己的权威。但另一些因素抵消了这些创新，在更大程度上削弱了君权。封建民兵没落，贵族几乎完全忘记了对国王的臣属地位。

① Spel. Gloss. in voce *Comes*.

② *Essays on British antiquities*. 不过，这种做法似乎在苏格兰和欧洲大陆各王国比英格兰更常见。

③ 宗室亲王担任郡长，不乏其例。Spel. Gloss. in voce *Vicecomes*.

骑士封地不断减少，国王征收免役税、以金钱补偿军役的理由也随之丧失。王室领地的转让使国王一贫如洗。《大宪章》的让步尤其限制了王室权力，国王行使非常规的武断权力变得困难和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国王自然会谋求小贵族或骑士的友谊。他们的影响力不足以威胁国王，自己受到大领主的压迫，希望获得王室余荫的合法庇护。因此，国王希望骑士们出席国会，抵消大贵族的横行跋扈。骑士们全体出席每一届国会，负担过重，势必造成混乱。通过令状召集少数几个骑士，虽然已经实施、效果良好，但也不完全符合国王的目的，因为这些人除了个人品格外，没有足够的威望，在大领主面前黯然失色。因此，国王豁免大部分小贵族出席国会的义务。为了回报这种照顾（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应该从每个郡选出一定数目的代表，为其提供经费。代表受到整个等级的信托，享有相应的权威。这种变通方法在亨利三世一朝几度施行，^① 在本朝形成定制。每个郡选举代表的数目没有固定，取决于国王的意志。^② 他们领有封地，因而属于贵族等级，列席于其他贵族当中。^③ 他们出席国会，看起来不是创新。虽然王权很容易改变代表的数目，从而操纵国会决议，但当时这一点并未引起重视。在那个时代，力量比法律更重要。国会多数派合法通过的决议，如果违反了强大少数派的意志，就不可能执行。

古代封建民兵的没落和废弃还产生了其他一些重要后果。

① Rot. Claus. 38. Hen. III. m. 7. and 12 d. ; As also Rot. Claus. 42. Hen. III. m. 1 d. Prynn's Pref. to Cotton's Abr.

② Brady's answer to Petyt, from the records, p. 151.

③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App. No. 13.

国王为了征税维持各种用途的军事力量，开支大增，超过他微薄的岁入所能支撑的程度。随着军事封臣替代军役的免役税日益减少，最后化为乌有，国王只能依靠国会和神职人员自愿提供的补助金。或者，他可以向王室领地内的市镇和居民征收领地税。以前，爱德华不得不向俗人征收所有动产的六分之一以上，向教会征收一半圣俸，^①用于进军普瓦图、镇压威尔士。爱德华及其继承人不断遭遇这种可悲的处境，使他想到一个新办法：召集所有自治市镇代表参加国会。看来，下议院事实上肇基于本朝第二十二年，深得民心的英格兰政体自此曙光初现。各郡代表仅仅代理小贵族和小男爵。莱斯特伯爵以前虽然召集过自治市镇代表，但他的国会被视为篡夺，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没有其他使自治市镇代表变得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个先例可能渐渐淡化，而不是发扬光大。

在这段时间里，英格兰国王效法欧洲其他各国君主，采取保护低等级勤勉民众的有益政策。低等级民众乐于服从司法和民政当局，以其技巧和劳作供给百货，对于装点和平、支持战备都不可或缺。英国居民仍然处于领主随心所欲的专横支配下，但有利于市民安全和自由的许多举措已经开始了，他们得以不受骚扰地享受勤勉的果实。自治市镇根据王室特许，在王室领地上建立。他们享有贸易自由的授权，获准以固定税率自行征收通行费和关税。^②他们获准选举自己的方法官，通过他们自行管理司法，无须出席郡长法庭或郡法

^①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p. 31. from the records. W. Heming. vol. i. p. 52. M. West. p. 422. Ryley, p. 462.

^② Madox, Firma Burgi, p. 21.

庭。人民一步一步获得这些公正合理的特权，后来的独立自主滥觞于此。^①但是，国王仍然保留了随心所欲地征收领地税或赋税的权利。^②尽管市民的贫困和当时的习俗保证了这些征敛既不会太频繁也不会太苛重，王权行使这样的无限权威仍然明显地压制了商业，与自由政体的一切原则绝对不能相容。不过，等到王室的开支成倍增长、索取资源的贪欲随之膨胀时，国王有权利索取却没有足够力量执行圣旨。他自然要在课税之前，先为征敛做好准备，借助恳求、规劝、威慑的手段，事先取得自治市镇的同意。国王很快就感到分别对每一个自治市镇征敛很不方便。爱德华体会到，取得供给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召集所有自治市镇代表，向他们陈述国家的需要，与他们共议国事，要求他们同意支付君主的需求。为此，国王向各郡郡长颁发令状，命令他们将每郡选派的两名骑士、每个自治市镇选派的两名代表送往国会。^③这些社区选派时充分授权他们同意国王及其议事会的要求。国王在这份令状开头写道：“最公正的规则，莫过于关系到全体问题理应获得全体的赞同。全体以联合的力量击退共同的威胁。”^④这项高贵的原则可能显示了国王慷慨的心灵，为自由

①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App. No. 1, 2, 3.

② 不仅国王有权向王室领地居民征收领地税，享有特许状的贵族也有权向自己领地的居民征收领地税。参见 Brady's answer to Petyt, p. 118. Madox's Hist. of the Exch. p. 518.

③ 令状颁发给大约 120 个自治市镇。

④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p. 25, 33, from the records. 这以前的国会令状仍然存在。要求的骑士如约而至，但没有自治市镇的承诺。这个范例发生在（下议院）初次开始召集的那一年。在此之前，课税貌似由每一个自治市镇各自表示同意，从伦敦开始。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p. 31, 32, 33, from the records. 也参见 his answer to Petyt, p. 40, 41。

和公正的政体打下了基础。

各郡参议会和平民议事会选出其议员后，议员们保证觐见国王、出席国会。他们的费用由选派他们的自治市镇承担。他们的等级和地位低下，难以理解立法者的角色。^① 自治市镇得知必须选派议员，或是市民得知他们当选议员，既没有荣誉也没有利益可言，都会极为不快。^② 确切地说，他们没有构成国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们和贵族、骑士分席而坐，^③ 后者根本瞧不起低等级的名士。他们一旦同意缴纳要求的税收，办完了这些事务，即使会议仍在继续进行、详细讨论国务，他们也会退席。^④ 他们全体都是选派他们的自治市镇市民。如果郡长找不到能力或财产足以胜任议员的人选，经常会瞒报辖区内的市镇。他这样弄虚作假，人民会感激他，而宫廷会不满。宫廷的意图是一视同仁地向所有自治市镇征税，大多数代表都会同意征税。^⑤

无论如何，自治市镇列席国会，在整个秩序中的分量与日俱增。他们渐渐形成惯例：作为保证财政供给的回报，他们有权向王室请愿，纠弹任何他们认为有理由抱怨的弊政。

① Reliquia Spel. p. 64. Prynne's pref. to Cotton's Abridg. and the Abridg. passim.

②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p. 59, 60.

③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p. 37, 38, from the records, and append. p. 19. Also his append. to his answer to Petyt, Record. And his gloss. in verbo. Communitas Regn. p. 33.

④ Ryley's Placit. Parl. p. 241, 242, &c. Prynne's pref. to Cotton's Abr. p. 14.

⑤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p. 52. from the records. 爱德华三世一朝，国王提名所有代表时，也有其例。Brady's. answer to Petyt, p. 161. 如果他公正地提名最有分量、信用最好的市民，这些人不期望从职务中弄到什么好处，他们的职能不是核查国王，而是规劝国王、同意他的要求。到理查德二世一朝，郡长才丧失随意隐瞒自治市镇的权力。参见 Statutes. at large, 5th Richard II. cap. 4。

国王的财政需索越来越多，他们的请愿也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国王很难拒绝这些保障和支持王室的人，他很可能马上就需要这些人的资助。不过，下议院在立法机构中仍然低人一等。^① 他们的请愿虽然获得王室的口头赞成，仍然只是法律的原型。此后，法官获得授权，将其制定为形式规范的法律。国王以其权威给予批准，往往没有贵族同意赋予的稳定性。那个时代对法律不规范性并不敏感。国王接受某个阶级的要求，颁布谕旨，看上去只与这个阶级有关，其他人不会感到不快。以前的国王几乎掌握了全部立法权，现在他并不介意以似乎无害的方式与人分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积累，人们渐渐认清了弊端，予以矫正。人们发现：一个等级不可以未经所有等级的同意，自行制定法律。法律的力量和效率完全依赖于条款术语措辞。因此，全国最强大的等级上议院有理由期望：一切公共法律条例都应当经过他们的明确批准。^② 亨利五世一朝，下议院请求：不能仅仅根据他们的请愿拟定法律，除非立法由他们自己起草，在他们的议院以法案形式通过。^③

但是，促成产业分割的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小贵族和骑士，也就是英国人称为绅士的那些人永远有增无减，降为一个仍然低于大贵族的等级。封地领有权虽然平等，但

① 参见本章末的注释四。

② Cotton's Abr. 中有这样的实例，国王亲临下议院答复请愿，他的权力可能不超过自古相传的王权，通过王室法令或公告调整事务。但没有贵族的同意，下议院单独请愿获得的立法一般不能持久。贵族不经下议院同意颁布立法，可能性更大。

③ Brady's answer to Petyt, p. 85. from the records.

权力和财产远不如人，渐渐失去了意义。各郡代表会议渐渐与贵族院分离，形成邦国一个独立的等级。^①在此期间，商业成长，私人财富和市民的重要性随之增长。王室经常提出财政要求，增加了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在重要场合，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各郡骑士，代表特定群体。他们共聚一堂议事，权利和特权相互混淆，不再被视为有失体统。^②就这样，平民第三等级最后演变成目前的形式。从此以后，乡绅代表自治市镇出席国会，不再有所顾虑。下院议员的区别完全消失了，下院的分量和重要性由此与日俱增。不过，下院的职能仍然非常不同于现在它借以造福公益的职能。下院不但没有监察和节制王权，反而自然而然地拥戴王权。他们视王权为法律与正义的源泉，视贵族为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压迫者，妨碍法律的执行，支持国王反对贵族。国王投桃报李，赞助这个益处甚多、危险甚少的等级。贵族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重视。于是，过去在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如此卑微的第三等级渐渐上升到目前的重要地位。他们的繁荣昌盛推动了技艺与贸易进步，使自由和平等变得必不可少。^③

市民院，也就是真正的下议院肇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当前事务的必然发展。与此同时，爱德华召集下级神职人员代表，在英格兰历史上尚属首次。^④国王要求他们向教区居民课税，以充国用。以前，圣俸不负国用之责。晚近以

① Cotton's Abr. p. 13.

② 参见本章末的注释五。

③ 参见本章末的注释六。

④ Archbishop Wake's Stat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p. 235. Brady's Treatise of Boroughs, p. 34. Gilbert's Hist. of the Exch. p. 46.

来，教皇的确多次征收圣俸税，有时还授权君主征收。^① 国王本人前几年就借助威胁和勒索，征收半数圣俸的苛税。但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政府既然需要臣民同意其任何额外支出，就很难重复这种做法。爱德华发现，谨慎的做法就是召集下议院，把国用的需要摆在他们面前，要求提供资助。但这一次他面临困境。也许神职人员认为他们是王国独立性最强的政治实体，也许他们对上一次横征暴敛深恶痛绝，断然拒绝支付五分之一动产税。国会第二次集会时，他们再次拒绝，国王只得退让，愿意接受十分之一。贵族和骑士毫不犹豫地答应出十一分之一。市民答应出七分之一。但神职人员仍然犹豫不决，不肯接受国王召集令状，以免他们的服从树立一个承认世俗政权统治的先例。他们达成妥协：国王将令状发给大主教，由大主教召集神职人员。于是，他们的集会看上去是在服从教会上级，就不再迟疑。神职人员追随几位主教分散在国会两院，没有像国王原来的意图和欧洲各国的情况一样形成单独的等级，原因就是那个权宜之计。^② 现在，我们回到叙事。

爱德华明白苏格兰国王反感的原因，也了解人民的性情。他们希望狂暴地发泄愤怒，正好可以供国王利用。爱德华利用人民拨给的供应，做好了反对北方邻邦的战争准备。这时，他得知约翰·巴里奥尔与菲利普秘密签约的消息。尽管同时对法兰西和苏格兰开战很不容易，他还是决心不能示弱于敌，也不能向他们的联合力量让步。他召约翰·巴里奥尔尽封臣

① Ann. Waverl. p. 227, 228. chron. T. Wykes, p. 99, 120.

② Gilbert's Hist. of the Exch. p. 51, 54.

义务，出兵随他抵御那时正在威胁他的法兰西入侵。接下来，他要求：在战争期间，苏格兰应该把伯维克堡、杰德堡和洛克斯堡交给他，作为安全保障。^① 他召约翰·巴里奥尔到纽卡斯尔出席英格兰国会。这一连串要求没有一个被满足，他就统率三万步卒、四千骑兵，挥师北上，惩罚叛乱的封臣。苏格兰民族几乎不能指望君主的勇武和才能，委派十二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实际执掌国政，^② 在目前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好防御准备。苏格兰人集结四万步卒，但只有五百骑兵支持，向边境前进。他们围攻卡莱尔城堡不克，转而东进，保卫爱德华兵锋所向的各省。但某些最强大的苏格兰贵族，罗伯特·布鲁斯父子、马契和安格斯伯爵，预见到苏格兰将在内乱外患夹攻下灭亡，试图及早屈服，以便迎合爱德华。国王受到这些有利事件的鼓励，率军进入敌境，在科尔德斯特里姆渡过特威德河，没有遭遇阻截。随后，他收到约翰·巴里奥尔的来信。苏格兰国王已经向教皇塞莱斯汀申请撤销自己和王国的效忠誓言，获得批准。爱德华嗤之以鼻。^③ 苏格兰人虚张声势，军事准备不足。入侵的英军已经攻陷伯维克城堡，总督威廉·道格拉斯被俘，七千守军战死。捷报传来，爱德华志得意满，派瓦恩伯爵统率一万两千人围攻邓巴。苏格兰贵族的精华尽在此地。

苏格兰人明白邓巴的重要性。此地一旦失守，全国势必门户洞开。他们的主力军由巴肯、雷诺克斯和马里伯爵统率，

① Rymer, vol. ii. p. 692. Walsing. p. 64. W. Heming. vol. i. p. 84. Trivet, p. 286.

② W. Heming. vol. i. p. 75.

③ Rymer, vol. ii. p. 607. Walsing. p. 66. W. Heming. vol. i. p. 92.

进军邓巴，企图解围。虽然敌众我寡，瓦恩伯爵并没有丧失信心，仍然英勇作战。苏格兰军队人数虽多，但纪律涣散，恐慌之下阵形大乱。瓦恩伯爵追奔逐北，遗尸遍野。据说，苏格兰丧师两万。次日，爱德华率英军主力来援，胜局已定，势在必得，邓巴守军献城堡投降。苏格兰总管詹姆斯献洛克斯堡投降。詹姆斯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始祖，再度被迫效忠爱德华。爱丁堡和斯特林城堡稍加抵抗，就开城投降。苏格兰南部立刻全部臣服英格兰。爱德华为了更好地征服蛮荒而难以经略的北部，调来威尔士和爱尔兰绥靖部队。他们习惯于断断续续的游击战，最适合追击亡命湖沼和山坳的苏格兰人。但苏格兰人一败涂地，斗志尽失。约翰·巴里奥尔软弱而怯懦，不满其臣民，敬畏英国人。虽然苏格兰人民在如此败局下仍然拥有许多资源，他却不加利用，径直屈膝于爱德华。他表示深切痛悔不忠于宗主，庄严郑重、不可挽回地宣布放弃王位，把国家交给爱德华。^① 爱德华挥军北进，直抵阿伯丁和埃尔金，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苏格兰人闻风迎降效忠。甚至桀骜不驯的高地人，虽然从不服从自己的首领、厌恶法律的约束，为了避免国家毁灭，也率先迎降。爱德华剪定全国兵不血刃，率军南返。苏格兰有一块石头，受到民众迷信的极大尊崇，苏格兰列王加冕时都坐在上面。源远流长的传统保证：这块石头在哪里，苏格兰的宝座就在哪里。这块苏格兰王座守护石保存在斯科尼，在一切灾难中维系着苏格兰

^① Rymer, vol. ii. p. 718. Walsing. p. 67. W. Heming. vol. i. p. 99. Trivet, p. 292.

最后的寄托。爱德华获得守护石，带回英格兰。^① 他下令销毁一切遗迹和记录，以防他们保存苏格兰独立的记忆，否定英格兰的宗主权要求。苏格兰人声称：爱德华也毁掉了苏格兰修道院所有的编年史。但是，像苏格兰这样野蛮不开化的国家不大可能拥有任何值得为之遗憾的史册。爱德华打碎约翰·巴里奥尔的御玺，把逊位君主带回伦敦，扣押在伦敦塔里。两年后，约翰·巴里奥尔获释，自愿流亡法兰西。他在法国也没有作任何复国的尝试，以布衣终老。瓦恩伯爵留任苏格兰总督。^② 各种要职都由英国人担任。爱德华自鸣得意，以为大功告成、夙愿已偿，对付苏格兰的种种诡计和暴行已经得逞，苏格兰已经最终臣服，就率领他的常胜军返回英格兰。

与此同时，爱德华试图收复吉耶纳，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国王派御弟兰开斯特伯爵率领七千军队前往法国。兰开斯特伯爵在波尔多初战告捷，但不久就因瘟疫在巴荣纳病故。林肯伯爵继任统率，直到战争结束，始终无所作为。^③

但爱德华野心勃勃、积极有为，他的征服虽然已经有大造于英国君主制，但只要被法王不诚实的诡计夺走的祖传遗产吉耶纳没有收复，爱德华就不会善罢甘休。他发现，吉耶纳地望偏远、鞭长莫及，决定攻击法兰西更为脆弱的部分。他抱着这个目的，迎娶荷兰伯爵约翰的女儿伊丽莎白，同时与弗兰德伯爵盖伊结盟立约，规定付给盖伊七万五千镑，组

① Walsing. p. 68. Trivet, p. 299.

② Rymer, vol. ii. p. 726. Trivet, p. 295.

③ W. Heming. vol. i. p. 72, 73, 74.

成联军进犯共同敌人菲利普。^① 爱德华希望自任英国、佛兰德、荷兰联军统帅，辅以他承诺提供或馈赠巨款的德国盟军入侵法兰西边境，威胁其首都，迫使菲利普放弃他兼并的省份，归还吉耶纳以换取和平。但是，国王要执行这样庞大的计划，必须先向国会要求补给巨款。爱德华没有遭遇多少困难，贵族和骑士批准了十二分之一动产税，自治市镇批准了八分之一。国王对自治市镇享有巨大、几乎无限的权力，因此可以向他们索取更多贡赋。由于神职人员热情支持蒙特福德一党，爱德华一直有反对教会的偏见，向他们征收更苛重的五分之一动产税。但在这里，他面临反对，一度打乱了整个计划，将他卷入了斗争。这种争执对历代先王都有致命危险，对爱德华也不无风险。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继承塞莱斯汀的法座，心高志大。教皇们的雄心往往与严格的戒律并行，但卜尼法斯另有所图。他决心君临世俗权力，将三重冕的权威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知道前任教皇向基督教世界各地教会横征暴敛，以致神职人员离心离德，给世俗当局提供了征敛教产的口实。卜尼法斯决定与众更始，以教界保护人自任，抵御一切侵袭。为此，他下车伊始，就颁布一份普遍的谕旨：未经教皇批准，任何世俗君侯不得征敛教产，教士也不得缴纳这种征敛。双方如果违背谕旨，就要面临被逐出教门的威胁。^② 据说，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德·温切尔西促成了这份重要的谕旨，目的是防范爱德华对教会的强暴勒索，国王变本加厉的需索使

① Rymer, vol. ii. p. 761. Walsing. p. 68.

② Rymer, vol. ii. p. 706. W. Heming, vol. i. p. 104.

他们有理由担心。国王要求神职人员缴纳动产的五分之一，可能比缴纳收益的五分之一更糟糕，因为他们大部分土地交由农奴耕作以及牛群放牧。教士们以教皇卜尼法斯的谕旨为挡箭牌，声称良心不允许他们服从。^① 国王没有立刻对他们的抗拒采取极端手段，但随后就关闭了他们的谷仓和畜棚，禁止佃客向他们交租。爱德华召集新宗教会议，协商讨论他的要求。大主教并没有因为国王明显决心已定而灰心，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回禀：神职人员有义务忠于教俗两个君主，但他们对前者的义务远比对后者严格。如果国王的命令（那时，王室的要求多多少少被视为命令）与教皇的明确谕旨相抵触，他们不可能服从国王。^②

神职人员在大量实例中看到，爱德华不尊重他们珍视的众多特权。国王以前就以武断方式夺走教堂和修道院的所有金钱和银盘，用于公共支出。^③ 他们根据这样危险的原则，直截了当地拒绝国王，势必引来狂暴的处置。国王没有请求教皇放宽谕旨，反而立刻决定运用手中的权力。爱德华告诉神职人员：既然他们拒绝支持世俗政权，就没有资格享受世俗政权的利益，因此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这样暴烈的措施立刻付诸实施。^④ 法官奉命不再受理神职人员的起诉，接受和审理起诉神职人员的案件，判他们的敌人胜诉，判他们败诉。^⑤ 神职人员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处境极尽悲惨之能事。他

① W. Heming. vol. i. p. 107. Trivet, p. 296. Chron. Dunst. vol. ii. p. 652.

② W. Heming. vol. i. p. 107.

③ Walsing. p. 65. W. Heming. vol. i. p. 51.

④ Walsing. p. 69. W. Heming. vol. i. p. 107.

⑤ M. West. p. 429.

们失去供应，无法维持家宅和修道院。如果他们出国寻找供应，暴徒就会抢走他们的马匹和行装，不可能获得任何补偿。大主教自己就在大路上被暴徒抢走了车驾和行囊，最后只剩下一个仆人，退居一处乡村教士的住宅。^①在此期间，国王作壁上观，坐视暴徒胡作非为，没有直接派王室官员迫害他们，没有不义和压迫的外表，却充分地报复了他们顽固的忤逆。大主教照例将所有侵犯教会人员和财产的暴徒逐出教门，但不起任何作用。爱德华满意地看到：人民自愿充当反对教会的工具，不再尊重他们长期敬畏、服从的神圣等级。

严酷的迫害摧毁了神职人员的斗志。约克邻近苏格兰前线，余悸犹在，疮痍未复，首先自愿投票通过五分之一动产税。索尔兹伯里、伊利和其他主教召集辖区在俗教士集议，决议不违反教皇卜尼法斯的谕旨，不缴纳五分之一动产税，而是另外筹集了一笔与之相当的经费，交给国王的官员。^②许多修道院和教士出了与之相当的经费，获得国王的保护。^③那些没有现钱的神职人员也承诺付钱。王国内几乎没有什么教士愿意为了维护教会特权而甘受迫害。这种冗长乏味、每况愈下的新型迫害最有害于精神的骄傲，殉道者也得不到教会为忠诚献身的追随者准备的荣誉和文饰。

国会提供的补给虽然相当可观，仍然满足不了国王的需要，征敛教会尤费周章。爱德华为了保证进一步的供应，运用武断的权力，压迫王国所有等级。他限制商人出口羊毛的

① W. Heming. vol. i. p. 109.

② W. Heming. vol. i. p. 108, 109. Chron. Dunst. p. 653.

③ Chron. Dunst. vol. ii. p. 654.